



中国现代文论中的人生论思想传统

——以民国文论专著为中心

陆舟

(浙江大学文学院,杭州 310058)

摘要: 现代文论中的人生论思想,起源于20世纪初期的文学革命浪潮。它在继承古代传统文论精神的基础上,融合了近代欧美与日本的部分文论观点,深入探讨了文学与人生的紧密联系,呈现出古今中外相融合的特征,并集中体现在民国时期以专著形式出现的文论作品中。人生论思想不仅为民国时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方法论指导,而且使初具雏形的中国现代文论体系进一步规范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思想不断演进和完善,为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提供了参考与启示。

关键词: 人生论;中国传统文论;中国现代文论;民国文论专著;文学概论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5)04-0155-08

Thought tradition of the theory of lif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Centered on monographs of literary theor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LU Zhou

(School of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life in modern literary theory was born in the wave of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spirit of ancient traditional literary theory, the theory of life absorbed some of the literary ideas of modern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ry theory as well as Japanese literary theory, provided an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life, and showca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a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over time, which was reflected in the literary monographs of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theory of life provided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literary creation at the time, further standardizing the fledgl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system. As time goes on, the theory is being constantly updated, providing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Key words: theory of life;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ry theory;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he monographs of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发端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在文学界倡导“破旧立新”。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冲击传统旧文学体系的同时,大量传播并译介海外文艺理论,为中国现

代文论的建构提供了重要参考,使其呈现出全新的发展态势。周作人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1]的导言中对该时期“新散文”蓬勃发展的缘由进行了

收稿日期:2024-08-31 网络出版日期:2024-11-21

基金项目:浙江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科研创新专项项目(S20230098)

作者简介:陆舟(1999—),女,浙江台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学人生论方面的研究。

阐述:“(新散文的发达与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民国时期的文学理论亦是如此,正是在“外援”与“内应”的碰撞融合中,在继承古代传统文论精神以及汲取近代欧美及日本文论内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不断完善,并逐步完成了现代化转型。无论是国内蓬勃兴起的文学革命浪潮,还是从国外引进的文艺理论专著,都对文学与人生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文学革命推动新文学迅速发展,并将其视为改造人生与社会的重要工具。毛庆耆等^{[2]55}认为:相对于旧文学,新文学的“新”主要体现文学价值观念上方面;新文学的形式并非对外国文学的简单复制,而是仍然会以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民族语言作为媒介手段。新文学与古代传统文学最重要的差异在于,新文学的种种观念是由外来文学理论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相结合而产生的,相比传统文学,新文学更加强调文学对人生与社会的改造意义,该特征自然在深受新文学影响的民国文论专著中有所反映。

在学制改革与学科建设的推动下,民国时期的文论专著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其中,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作为众多文论专著关注的重点话题,得到了深入细致的论述。这一时期的文论专著往往采用“文学概论”之类的书名,章节分明,层次清晰。它们广泛援引古今中外的文论观点作为参考例证,致力于对文学的性质、要素以及各种文学现象进行较为客观详实的分析,进而构建了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此背景下,蓬勃发展的民国文论专著在人生论的阐述方面带有一定的功利主义色彩,试图从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出发,思考如何借助文学来改变中国社会的前途命运。同时,文论家在传承传统文论精神的基础上,吸纳了部分外来译介文论的思想,呈现出古今中外相融合的特征。民国时期文论专著中的人生论思想尽管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与理论缺陷,但仍然为包括文学人学论等在内的当代文艺理论以及新时期人生论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参考。与此同时,人生论也伴随着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革新,在时代的变迁中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目前学界对现代文论中的人生论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人生论美学和对现代知名作家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探讨。尽管这些领域成果颇丰,但总体上显得较为零散,未能从理论层面深刻地把握

文学人生论,形成系统化的研究体系。此外,学界对民国文论专著中涉及文学人生论部分的专门性研究尚显不足。虽然大部分文艺学及文学史专著对现代文论的起源于发展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但在人生论思想方面往往是轻描淡写,缺乏深入的专门性研究。从内容上看,涉及人生论思想的文献多停留在表面介绍,甚至缺乏对基础观点的分类以及归纳总结,更遑论将这些观点进行整合。大多数相关文献并未对民国文论专著中的人生论思想进行详尽的系统整理和分类,也未充分认可该时期文论专著的理论价值。然而,通过对相关原始资料的研读可以发现,即便是在原创性上受到批评的文论教材,其对文学人生论的阐释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论的精神,有效融合了中国传统文论及从西方吸收的理论框架,展现出了那个时代中国文论体系的理论自觉。本文试图系统阐述现代文论中的人生论,并填补这一研究空白,以民国时期的文论专著为研究中心,探讨文学人生论的起源、发展以及其时代价值和对外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反思该时期文学人生论体系在构建过程中所暴露的缺陷与局限性,为当代文论的建设提供参考和启示。

一、会通中外,化合古今:人生论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

从广义上讲,中国现代文论中的人生论思想主要源自两个理论脉络:一是中国古代文论中零散的理论观点及其所蕴含的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二是同期外来译介文论的相关思想。现代文学和现代文论之所以能够诞生和发展,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的文学革命者们深切感受到本国在思想文化上的滞后。在倡导民主与科学的同时,他们自然而然地要求文艺领域也实现现代化转型。在这种推动力下,现代文论在发展过程中,借鉴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文论观点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现代文论在这一过程中,依然吸收并继承了古代文论的某些传统精神。

中国古代文论于早期便将文艺的产生缘由与个体活动以及社会生活紧密关联起来。正如《毛诗序》所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3]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中有众多此类表述,从文学产生的动机切入,着重强调文学与创作主体精神需求的密切关联,并且在此基础上,同时关注文学对社会的功用,赋予文学影

响并改造社会人生的重大意义。除了这些较为零散的理论在内容上所能给予的启迪之外,古代传统文论对中国现代文论中的人生论思想最为重要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精神层面。王瑶^[4]认为,爱国主义传统、现实主义传统以及人本位思想等,皆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联系的主要精神特征。中国现代文论与古代文论之间的联系亦是如此。以人生论思想为例,正因为中国古代文论在形成之初便着眼于人生、社会、文艺三者相互影响与制约的关系,高度重视文艺在个人及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民国时期的文论家们才能够在古代文学与文论中的爱国主义传统以及儒家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不断尝试在文艺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探讨文艺的个体需求与社会节制的矛盾与统一,进而不断推动文艺与人生在“既适应又不相适应的矛盾中向前发展”^{[2]5}。尽管中国古代文论很早就对文学与人生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探讨,然而相关文本多呈现出零散的特点;同时,往往将理论叙述与文学批评混杂在一起,并与史学哲学思想相互融合。在20世纪初期的学科建制改革之前,并没有专门针对文学与人生关系问题的系统性理论,直至各级学校开设文学概论课程,文学理论专著以教材形式大量涌现,在这些系统性的文论专著中才出现有关文学人生论的详细阐述。

除此之外,该时期的文学人生论在发展过程中还显著受到了外来文论的影响。大多数文论专著不仅在形式和结构上借鉴了同期通过翻译引入的外国文论,而且在内容和编排上也广泛参考了西方和日本的文论专著。其中,西方文论专著以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和亨德的《文学概论》为典型代表,而日本文论专著则以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最为突出。同时,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的文学社会学思想也成为了民国时期文论专著中关于人生论阐述的重要理论来源。泰纳在《英国文学史》的序言以及《艺术哲学》等著作中为学术界提供了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他成功地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引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吸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论以及斯达尔夫人的文学社会批评理论的精华之后,构建了社会学美学的体系。在这一方法论的支持下,泰纳提出了著名的“三因素说”,将“种族”(Race)、“环境”(Milieu)、“时代”(Moment)视为影响创作主体和文学演进的三大重要因素。

美国文艺理论家亨德在其著作《文学概论》^[5]中

提出,泰纳的三重学说能够提炼出文学中的社会学元素,从而使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更加明晰。除人种、环境和时代之外,亨德还引入了“人格”这一因素,将作家的人格(Personality)作为对“三因素说”的补充,且认为人格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时,亨德谨慎地指出,这四要素对文学的影响并非如泰纳所主张的那样具有普遍性,也不能断言文学绝对无法脱离这些条件而兴盛,它们只是在一般情况下对文学发挥重要作用的四个要素。亨德强调“但凡文学取得有变化而强有力的形式时则特别容易觉察”,进一步严谨和完善了泰纳的“三因素说”。该理论对民国文论中有关人生论及文学社会学的部分产生了重大影响。温彻斯特在《文学评论之原理》^[6]中也谈及了作家人格对文学的影响,并由此拓展到文学与人生真理的关系。他认为文学是人生真理的表达,是作家想象中人生的呈现,伟大的文学需要作家在创作时将理智观念与人生真理相结合。温彻斯特指出,作者与常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人格具有独特性,“而文学之趣味亦大半出于作者具特异之人格”,所以在研究与鉴赏文学时需要了解作者的生平个性。在亨德与温彻斯特等人对“三因素说”进行补充的基础上,民国文论专著将其运用于人生论的阐述之中,旨在说明文学与时代人生的相互影响,成为人生论的重要理论参考。

而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著作《苦闷的象征》是对众多西方文艺理论观念的一次创新性融合。在吸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基础上,他用柏格森哲学中的“生命力”概念取代了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并将之与克罗齐关于创造性的美学理论相联系,赋予“生命力”以现实性和创造性的深刻内涵^[7]。在《苦闷的象征》的第一部分创造论中,厨川白村探讨了文学与人生、个性及生活之间的联系,主张生命力赋予人类个性,而当个性发挥出来的时候,“就是人们为内底要求所催促,想要表现自己的个性的时候,其间就有着真的创造创作的生活”^{[8]3}。此外,厨川白村在鉴赏论中提出了“生命的共感”^{[8]31-32}概念,认为文艺作品是作家生活深处所潜藏的人间苦难,而不同个体之间具有唤起对这些苦难共感的能力。他强调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存在的共通性和共感性,认为这使得“象征”成为媒介,能够在精神层面产生共鸣,从而使艺术鉴赏成为可能。厨川白村从文学创作与鉴赏两个维度探讨了文学与人生的联系,无论是在体例还是内容上,都成为民国时期文论专著的重要参考。

民国时期的文论专著,在广泛吸收大量外国文论观点的前提下,依然继承并大力弘扬了中国传统文论的特色。同时,结合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与创新,进而构建出独立且完整的人生论体系。

二、民国文论专著中的人生论阐释

民国时期的文论专著对文学与人生的关系问题表现出极为强烈的关切。其中,大部分专著都专门为此问题单独设立一个章节进行深入讨论,同时在“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国民性”等相关章节中,也结合人生论思想展开论述。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文论专著认为文学源自人生经验,并且能够在此基础上对人生产生反作用。在利用泰纳的“三因素说”阐述文学与人生关系的过程中,对该理论进行了丰富与改造。此外,还提出了若干将人生论运用于创作实践的方法论,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探讨文学与人生的联系时,多数民国时期的文论专著都得出了一个相似且普遍的结论:文学既源自人生经验,又能反映和指导人生。文论家们在阐述这一观点时,首先关注文艺的本质和产生机制,从而得出文学根植于人生经验和实践的结论。夏炎德在1933年出版的《文艺通论》中,用诗意的语言表达了文学源于人生的观念——“文艺是人类求生的一种表白”^{[9]13}。受厨川白村的影响,他认为文艺的产生源于艺术家受到周围环境和个人内心的双重刺激,正是这两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激发了文艺创作。从文艺的性质来看,文艺不仅表现了作者的内心世界,也描绘了普遍的人性,包含了对过去和现实的叙述,以及对未来理想世界的憧憬。文艺既是作者人生经验的表达,也是想象中新境界的创造,是作者自我与人间万象的书写。左翼作家顾凤城在撰写《新兴文学概论》时,吸收了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的艺术劳动论思想,认为文艺的起源与社会的劳动生产紧密相关,文艺无疑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他指出,如果一篇文学作品脱离了社会实践,其内容必然是空洞的。因此,他强调:“我们在观察文学在社会上的任务时,必须从现实生活里去理解它”^{[10]21},这样才能明白人性和时代精神是如何反映到文艺中,并产生了与之相呼应的文学作品,从而自然引出文学反映人生与时代的重要功能。

在明确了文学源于人生经验这一观点之后,民国文论专著进而探讨了文学对人生与社会是如何产

生反作用的问题。孙俚工^{[11]118}从肉体与精神两个层面阐述了文学对人生的作用。他认为,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心是由细胞构成的,而文学又具有刺激细胞的功能,它甚至可以打通各个感觉器官,“利用神经的感觉而在人的心上发生一种作用,利用听觉和视觉悦乐人心”。孙俚工^{[11]118}重视文学“悦乐精神”的功能,甚至将其视为文学对人生的本质意义。文学能够在悦乐精神的基础上,给个体以自意识,让人不仅仅满足于虚伪和表面之物,告诉人们社会和人生本来的姿态,并且“让人们开始去怀疑违反生命本质要求的事物,开始从义理和人情方面去听从人类固有的内心的要求”。从个人层面而言,文学能让个体在阅读与品鉴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由此获得精神方面的纯粹快乐;而从整个人类群体的层面来看,文学可以展现人类意志与生活的真实面貌,进而引领人类不断前进和发展。

夏炎德^{[9]16}认为,文艺不仅具有反映和批判现实生活的能力,更能够对人生产生指导和创造性的影响。这是因为,文艺创作者对于周遭事物的感受往往更为敏锐和深邃。他们不仅能够根据现实社会描绘出生活的真实图景,而且能够在此基础上,借助想象力构建出一个理想的人生蓝图。通过这一过程,文艺能够“将我们暧昧污浊的生活整理洗涤,将杂乱幼稚的生活整理出一个头绪,启示出人生的新道路”。夏炎德^{[9]17}指出,文艺是人生“彻头彻尾”的表达,它不仅源自生活、表现生活,还能在抚慰和批评生活的同时,指导和塑造生活。他特别指出,文艺创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并非刻意追求这些效果,而是“不期然而然的自然结果”。由此可见,自文学诞生之初,它就与人生产生了一种不可分割的自然联系。

在对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进行详尽梳理的前提下,民国文论专著针对如何将人生论应用于文学创作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思考。孙俚工^{[11]114}提出,文学一方面源自真实的人生经验,另一方面又是人类因求知和发展的本能而产生的精神食粮。故而,优秀的文学作品需追求客观真实,运用艺术手法“写出人在各式各样的事件中或情境中谋求全部生活的姿态”。马宗霍^{[12]76}则结合人生论对文学创作实践给出了更为具体的建议。他指出,文学首先是选择之人生。文学家进行创作的第一步是考察人生,对收集到的人生材料加以甄别,判断出哪些材料具有代表性价值后,再将其呈现在文学作品中。优秀的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人生,相较于普通人的一生更为完

备,足以成为社会之模范,起到教育和启示作用,进而推动人生进步。他还特地点明了不善选择者在创作时容易犯的两个错误:一是因偏于理想化而流于虚伪,过于追求表现善而文饰恶;二是由于狭隘的阶级观念,认为大多数平民的人生不能作为文学材料,从而成为“贵族文学”,仅能代表某个阶级。此外,他认为文学还应当是论理之人生。文学作品在叙述和表达人生时,必须遵循严格的论理次序。因为人生各个时期发生的事件是连绵不断的,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部分断片,而仅仅将这些没有梗概和结构的断片作为文学,会致使阅读与表达效果欠佳。马宗霍^{[12]77}指出,如果了解人生的全部,在记事时“必首察此事之所起,继探此事之所经,终考此事之所结,按照本末先后一一叙述,或由因推果,或由果溯因,一篇文有脉络,有照应,整然不乱”,唯有以这样的叙述方式,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民国时期,那个充满救亡图存紧迫感的时代背景下,大多数文论家在探讨人生论时,不仅关注文学对时代和现实社会的改造作用,而且不满足于将人生论仅仅局限于文学创作的实践层面。他们试图将文学与革命紧密联系起来,通过文学对个体精神的影响力来引领革命思潮。以顾凤城为代表的左翼文论家认为,文学与人生、社会生活密不可分,因此文学应当是“非个人主义的,成为大众的集团的东西”^{[10]33},并由此延伸探讨了文学的阶级属性,并强调在文学创作中应积极参与革命实践。张天化在其著作《文学与革命》的开头便开宗明义地提出:“文学是革命的先锋,革命是文学的后盾。”^[13]他深入探讨了文学与革命之间的联系,试图通过分析文学对生活的影响来阐释两者的关系。张天化认为,自从人类社会形成以来,不平等和剥削就一直存在,使得人生充满了苦难。然而,人生之所以能够继续前进,是因为文学中蕴含着能够激发受众的“新希望”。他指出,所谓的乌托邦和理想国,实际上是文学家对现实不满而构想出的一种“希望中的环境”。当文学创作者试图描绘出他们所期望的环境时,无论遇到何种挫折,都能够克服困难,构建出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界。这正是文学家与革命家的共同之处。

而夏炎德在阐述文学对人生的反作用之际,将文艺比作时代与社会的“温度计”与“标准尺”^{[9]34}。他认为文艺能够直观地反映出时代精神与社会现状,赋予文艺家引进时代思想的重任,甚至直接把文学与革命相关联,强调文艺家必须具备社会责任,反映社会矛盾,为底层人民发声。不过,与顾凤城等人

不同的是,他着重指出,虽然文艺家能够敏锐地洞察社会人生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这一点与革命家确有共通之处,但二者最大的差异在于:文艺家通过在作品中具象地描写人生,唤起读者的共鸣,凭借情感上的共通来实现感染效果;而革命家则是“用某种思想有意地将观念注入人的脑中,以引发人的信仰为目的”。所以,优秀的文艺作品应当自然而然地反映人生全貌,而不应在创作之初就怀有功利性目的。这也是夏炎德在人生论阐述中始终强调的重点:文学应当反映人生,但这并非作家的创作动机,而是创作的必然结果。

尽管近代西方和日本的文论对民国时期的专著在构建人生论时提供了理论借鉴,但文论家们并未简单照搬这些理论,而是结合中国现代文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理论创新。泰纳的“三因素说”便是这一创新过程中的典范。泰纳的文学社会学理论深刻影响了民国专著中的人生论思想,尤其是“三因素说”,它成为了探讨人生与文学关系的关键参考框架。在亨德等人对“三因素说”进行扩展的基础上,民国文论专著将其应用于人生论的阐释,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对该理论的本土化创新。茅盾在1922年发表的《文学与人生》一书中,参考了亨德的观点,巧妙地将“三因素说”融入对文学与人生关系的讨论,并结合个人主观经验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创新性的拓展。茅盾提出,每位作家都拥有独特的个人人格,而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创作主体人格的体现。他强调,作家的人格“并非直接反映在其书写的内容和材料上,而是通过作家处理这些材料的方法显现出来,在这些处理方法中,作家已经融入了自己的人格”^[14]。茅盾所强调的“人格”更多地指向作家在种族、时代和环境影响下形成的个人风格,这不仅仅是将“人格”作为一个独立要素添加到泰纳的理论体系中,更像是对三要素的一个综合性的总结和提炼。此外,茅盾还特别指出,革命者创作的文学作品必然与其革命精神紧密相连,他断言:“革命的人,必定创作革命的文学。”^[14]这表明,文学作品不仅是艺术的表达,也是作者精神和信仰的直接体现。

茅盾的观点在同期引发了文论专著对“三因素说”的改造热潮。孙俚工^{[11]132}将泰纳的“三因素说”与茅盾在此基础上的改造相结合,直接以“人格”取代“时代”,认为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能够直接用种族、环境及作家人格这三个要素来加以解释。他对其中的“人格”概念又给出了自己的阐释,在科学意义上,“人格就是时代的潮流、种族的遗传以及作家本人的

生活环境所熔铸而成的结晶”。同时,他认为自然环境中的风景气候、人文环境中的文化教育等因素对文学的影响颇为深刻,所以,作品中的作家人格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环境在作品中的反映。而卢冀野^[15]则将“三因素说”中的“人种”视作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并提出用内涵更为广泛的“民族性”来取代“人种”一词,认为民族性是文学的灵魂,不同民族的特性会对当地的文学风格产生极大影响。例如,东方民族多具神秘性,致使东方文学多有超现实思想,他还列举《诗经》中周南之诗与周北之诗的不同,进一步说明地方色彩对文学的影响。他同时也对时代与文学创作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解读,认为作家一方面不得不得受时代洪流的裹挟,与时代妥协;另一方面作家也可成为时代前驱,而绝代天才更是能够以个人意志左右世人、指导时代,由此可见文学与时代人生相互影响之深刻。

民国时期的文论专著在阐释人生论时,对泰纳的“三因素说”进行了创新性的本土化改造,这一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当时现代文论专著对外国文论的译介和本土化处理方式。文论家们在吸收和借鉴海外先进的文论思想的同时,紧密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时的社会现实,对人生论进行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解读。这一融合与创新的过程,不仅考验了学者们对外国文化的包容能力,也考验了他们对传统文论精神的坚持和传承。正如贺根民所指出的,对于民国时期的学者而言,编纂体系化的文论话语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追求,更隐含着民族文化立场的弘扬。在文论体系的显隐之间,实际上是“中西文论的话语角逐”。在这种背景下不断发展的民国文论体系话语“是国人追踪现代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固本开新精神的具体体现”^[16]。

三、人生论的时代局限及当代回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文论专著,在继承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并汲取海外文论精华的前提下,深入探究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问题,同时尝试以人生论思想为文学创作提供方法论指引。从当代文论建设的视角来看,民国文论专著中所探讨的文学人生论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和时代局限性。

首先是理论原创性的缺失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论专著的共同弊病。当时的大部分文论专著,无论是篇章布局还是形式体例,均参考了欧美及日本的若干文论专著,且专著之间相互仿效的现象极为常见。不同的专著在探讨

相同内容时,常常在形式上采用相似的体例,甚至在内容上列举同样的例证,引用相同的文论观点,致使最终呈现的内容趋于同质化。

同时,在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环境下,部分民国文论专著在进行人生论阐述时,总是刻意强调文学与时代以及国民性的关系,过度强调实践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理论性。虽然有一部分文论家如夏炎德等人在人生论阐述中坚持将文学“去工具化”,认为即便文学具有反映和指导人生社会的功能,也不能将其作为目的而先入为主地进行文学创作,但以顾凤城等为代表的部分左翼文论家仍然刻意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甚至迫切希望将文学作为工具应用到革命浪潮中去。这种功利主义色彩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生论的纯粹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同样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启蒙救亡为己任的时代精神。

尽管民国时期的专著在人生论的探讨中存在一些不足,但其理论价值仍然不可小觑,并且在当代依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当代文论中的文学人学论和文学主体性理论,还是人生论美学,它们都与民国时期的文论中的人生论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共通之处。文学人学论的先行者钱谷融在《以简代文——致李岭同志的一封信》中提到:“在九十年代的某一天,我偶然翻阅了泰纳所写的英文版的《英国文学史》一书,在该书的序言中,泰纳用直白的语言说,‘Literature, it is the study of man’……‘文学是人学’这句话的发明权,不应该属于高尔基,而是应该属于泰纳。”^[17]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序言,不仅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文论专著阐述人生论时的重要理论参考,而且在理论来源上与当代文论有着一定的相似性。现代文论中的人生论思想和当代文论中的“文学人学论”都强调了“人”在文学活动中的核心作用。

人生论强调文学对人生的反映以及文学对人生的影响,赋予创作主体以重要地位,强调文学家在描绘人生面貌、传递时代精神、激发读者精神共鸣方面的重要职责。同时,人生论也重视作为接受主体的广大民众,认为文学应当真实地反映民众的生活,继承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人道主义传统。而“文学人学论”同样重视人在文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朱立元指出,“‘文学是人学’的核心和基础是文学应当‘以人为本’,以人道主义精神为灵魂的观念,即强调文学‘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反对将人的描写作为‘工具’和‘手段’”^[18],这与民国文论中

的人生论在精神层面上是相通的。从内容上看,人文学文学论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与人生论相似,都强调个体个性的重要性,认同文学源自于人生经验和社会实践。

与民国文论专著中尚不完善的人生论体系相较而言,中国当代文论在对文学与人生关系问题的探讨上显然更为成熟。其中,当代人生论美学不但对“人生论”这一在民国文论专著中较为模糊笼统的概念予以细致辨析,还在结合西方文艺美学以及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基础上构建起完备的理论体系。张弓等^[19]从新实践美学的视角出发,对人生论美学的内涵及特点进行了概述与总结,认为人生论美学是以人生对人的审美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美学思想体系,彰显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以及中华民族美学精神,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向内求善”的伦理型美学思想的定向发展。王元骧^[20]则对人生论的概念进行了详尽阐释。他指出人生论应是一门综合性学问,其内容涵盖“目的论”“价值论”和“生存论”三个主要方面。其中,目的论属于人生论的形上性层面,价值论属于人生论的社会性层面,存在论则属于现实性和个人性层面。从这三种不同层面出发,王元骧^[20]对新时期的“人生论”概念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得出综合性结论:人生论“是立足于人的生存活动来对目的论和价值论的意义所作的一种阐释”。王元骧认为“人生论”并非人性论所研究的人的自然本性,指出人生论“不仅把人看作是感性与理性、个人性与社会性统一的人,而且还是处身于一定现实关系中从事实际活动的人”^[21]。在此基础上,他对学界曾一度流行的“推倒反映论以使文学重获新生”的观点提出驳斥,认为从文学作为精神现象的性质来看,它绝不可能自然诞生,而是依附于个体生活与社会存在的产物。即便文学反映的对象不仅限于外部世界,还包括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及其想象和虚构的产物,但归根结底,文学仍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这与民国文论专著对文学与人生关系阐述的基本观点相一致。然而,与当代文论相比,多数民国文论专著只是将文学所反映的内容局限于表面的社会现象与客观事实。而王元骧认为,应将这些客观事实所引发的个人情感及意志等内心主观活动都纳入到文学对现实的反映之中,强调作家的主观意志和情感体验在文学反映生活的整个发生机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大部分民国文论专著仅仅聚焦于文学对接受主体在心灵层面所产生的影响,然而王元骧^[22]却特

意指出,文学对读者的作用并非仅限于心灵层面,而是会进一步切实地影响他们的实际行动,并最终在生活与实践中得以体现。他就此将认识论与实践论统一起来,对在文学活动中同时作为目的和对象的“人”所具有的主体性进行了充分探讨,进一步深化了人生论的理论意义。王元骧的人生论美学将“人”作为艺术活动的目的,试图在这一过程中使“人”恢复完整性和统一性。与传统美学相比,它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人的生存境遇和意志活动上,从而使审美价值从“由‘情’至‘理’”转向“由‘情’至‘志’”的新维度。金雅^[23-24]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史进一步挖掘了人生论美学的价值意义。她在多篇论文中,将中国现代美学传统与美育人生及美学理论建设相联系,介绍了20世纪以来“大美”的民族美学话语谱系形成历程,以及中国现代美学追求审美、艺术、人生相互融合统一的人生论精神。同时,关于20世纪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的理论研究也同样受到重视。例如,尹倩文^[25]对“人生艺术化”这一命题的起源与发展进行了剖析,认为中国现代文论史中的“人生艺术化思想在当时较为严峻的社会背景下,构建了一条“以出世来入世”的人生路径,充分展现了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与责任感。而潘立勇等^[26]则将人生论美学与当代生活美学相联系,揭示了现代美学家在坚持儒家文化及传统人生观的基础上,巧妙结合西方近现代美学思想,完成了当代生活美学的理论创新过程。

总体而言,新时期的人生论美学在保留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积极吸收中西文化交流的精华,并在当代文艺实践的探索中不断拓宽视野。无论是在内容的深度还是形式框架的创新上,它都实现了对现代文论中人生论思想的超越和突破。

四、结 语

民国专著中的人生论崛起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转型阶段。在新文化思潮以及民族文化复兴浪潮的冲击下,众多文艺理论家广纳博采、中西融合,充分展现出该理论的先锋性与包容性。从理论创作的动机来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文论专著带有显著的启蒙色彩,试图在新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向社会各阶层传播“纯文学”的理论概念,进一步深化文学的学科内涵,促使初具规模的现代文论系统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与完善。其中,文学人生论在汲取大量古今中外文论观点的基础上,构建起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它强调文学源于人生经验,反映社会人

生,能够批评和指引人生,并在此基础上从新的视角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方法论。从形式上而言,民国文论专著对文学与人生关系理论的阐释,是中国现代文艺界将文学理论规范化与系统化的一次尝试;从内容上来说,人生论肯定了文学创作主体的地位,赋予作家批评与反映真实社会人生的功能与责任,激励当时的文学创作者们通过人生论认识到文学对反映及改造社会人生的重要作用。同时,人生论中蕴含的以人为本思想以及对创作主体、接受主体重要性的强调,还为当代包括文学人学论、文学主体性理论以及人生论美学等在内的文艺理论思想提供了素材与启示。从民国时期的人生论,到20世纪八十年代蓬勃发展的文学人学论,再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人学思想以及人生论美学在当代的发展,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命题始终充满生机,并在不同时期学者的研究与创新中持续绽放新的活力。

人生论致力于深入探讨文艺与美在人生中的深远意义,旨在塑造个体的自由独立人格,并提升主体的审美境界。在当前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背景下,科技与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大众文学的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催生了大量仅为迎合消费主义而创作、缺乏深刻思想内涵、忽视对现实人生关怀的文本。面对这样的挑战,更有必要秉持文学创作的初心,坚持新时期文学人生论的发扬光大,引导文学活动回归现实人生,对个体的价值观进行积极的塑造和引导。

参考文献:

- [1] 周作人.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C]//刘运峰.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116.
- [2] 毛庆耆,董学文,杨福生. 中国文艺理论百年教程[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 [3] 萧统. 文选[M]. 李善,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029-2030.
- [4] 王瑶. 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5):3-16.
- [5] 亨德. 文学概论[M]. 傅东华,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85.
- [6] 温彻斯特. 文学评论之原理[M]. 景昌极,钱锺新,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7.
- [7] 任现品. 《苦闷的象征》:西方文化思潮的创造性整合[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199-207.
- [8] 厨川白村. 苦闷的象征[M]. 鲁迅,译.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 [9] 夏炎德. 文艺通论[M]. 上海:开明书店,1933.
- [10] 顾凤城. 新兴文学概论[M]. 上海:光华书局,1930.
- [11] 孙俚工. 文学概论[M]. 上海:广益书局,1933.
- [12] 马宗霍. 文学概论[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
- [13] 张天化. 文学与革命[M]. 上海:民智书局,1928.
- [14] 茅盾. 茅盾文艺杂论集[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112.
- [15] 卢冀野. 何谓文学[M]. 3版. 上海:大东书局,1932:29-31.
- [16] 贺根民. 《中国文学批评通论》:民国文论体系建构的独特文本[J]. 兰州学刊,2018(8):55-64.
- [17] 钱谷融. 以简代文:致李岭同志的一封信[J]. 文艺理论研究,2003(4):50.
- [18] 朱立元.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再阐释:兼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学基础[J]. 探索与争鸣,2008(9):4-10.
- [19] 张弓,张玉能. 建设人生论美学:从新实践美学的角度看[J].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7(4):45-55.
- [20] 王元骧. 关于推进“人生论美学”研究的思考[J]. 学术月刊,2017,49(11):99-105.
- [21] 王元骧. “人生论文学观”刍议:关于推进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思考[J]. 文学评论,2023(1):23-27.
- [22] 刘毅青,王颖欣. 人生论美学的中西综合创造之路:以王元骧为中心[J].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24,27(1):112-125.
- [23] 金雅. 大美与中国现代美学的人生论精神[J]. 中外文论,2021(1):55-63.
- [24] 金雅. 中国现代美学对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与发展[J]. 学术月刊,2018,50(2):114-122.
- [25] 尹倩文. 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初探[J]. 艺术教育,2019(1):40-41.
- [26] 潘立勇,刘强强. 从现代人生论美学到当代生活美学:生活美学的历史脉络与现代渊源[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9(4):16-25.

(责任编辑:柯 丹)